

德国绿党“寡头化”嬗变： 基于米歇尔斯政党理论的分析

朱苗苗

摘 要：在西方代议制及其政党体制内，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的主要目的和行为就是获取权力，从而决定了其“寡头统治”的宿命。这是由西方代议制、政党获取权力的机制以及精英民主思想所决定的。起步相对较晚的德国绿党为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也唯有在德国政党体制内争取最大权力，参与党派竞争，并尝试赢得选举。为此，绿党经历了一个被迫的学习过程，并且在政治系统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完成了从一个运动型的另类政党向建制派政党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绿党也不可避免走向“寡头化”，其主要嬗变表现在：第一，组织目标从成为“反政党的政党”变为追求选票和参与执政；第二，作为建党基本原则的基层民主制空心化、形式化；第三，党员专业化，领袖职业化、个人化和精英化，政党权力中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关键词：德国绿党；寡头统治铁律；寡头化；政党体制；民主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中心 副教授 博士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D7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4)06 - 0023 - 27

2024年9月底，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绿党经历了德国东部三个联邦州选举的“灾难性失利”后，双党主席和青年绿党联邦理事会成员全体辞职。媒体和专家表示，绿党“身陷十年来最深危机”，再次站在选择新方向和新战略的十字路口。伴随着这次关于绿党危机的讨论，“每90秒钟就有一名记者爱上罗伯特·哈贝克”^①的媒体现象以及把绿党称为“哈贝克联盟”的说法反复出现在大众视野。绿党何以从依赖基层的运动型政党转变成典型的精英领导下并逐渐“寡头化”的建制派政党？它

^① 这句话源自德国基民盟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2019年对时任绿党双主席之一的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的评论。

转变的逻辑何在?

德裔意大利著名政党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 - 1936)在100多年前提出“寡头统治铁律”,认为每一个政党组织都代表着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强大寡头组织,而政党组织终将沦为少数人的“寡头统治”。这是对政党党内民主进行的深刻批判。“寡头统治铁律”论断并非对西方民主的否认,它一直都是学者研究西方政党、代议制民主和官僚政治的主要理论之一。“寡头统治铁律”是以西方精英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论断,而代议制民主从概念到实践都无法逃脱民主和非民主之间的内在张力。^①

在西方政党研究中,将民主化界定为政党竞争性选举程序的建立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一环。^② 根据其理论建构,西方代议制和政党制度是西方“民主”的重要体现。从这样的理论建构出发,西方代议制和政党民主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榜样,一度让许多非西方国家视为效仿的典范甚至政治制度发展、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然而当前,西方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之间日益增加的巨大张力让其面临极端民粹主义、党内民主和全民公决的多重挑战。^③ 欧洲和德国正深陷其中。因此,本文聚焦德国绿党“寡头化”嬗变过程,从“寡头统治铁律”视角来分析德国绿党嬗变,及其与议会民主制、党内民主、政党组织“寡头化”的关联性。

一、相关研究概述

国内外关于德国绿党发展和转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绿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④第二,绿党在联邦和联邦州选举获胜或失利的原因。这两点都会涉及绿党崛起的过程和原因。其中,外部环境、党的政治理念、竞选纲领以及议题是最常见的分析视角。

学者杨解朴从“议题所有权”视角分析了德国绿党在当前德国碎片化政党格局

^① 丁辉:《走向“弱竞争民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嬗变与代议制民主的危机》,载《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4期,第49-72页,这里第51页。

^② 胡淑佳:《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建构过程与逻辑方法》,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2期,第123-131页,这里第129页。

^③ 同注^①,第49页。

^④ 在众多关于德国绿党的成立和历史发展的德文文献中,政治学家约阿希姆·拉什克(Joachim Raschke)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关于德国绿党的著作值得研读。参见Joachim Raschke, *Die Zukunft der Grünen — So kann man nicht regier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2001。德国历史学家希尔克·门德(Silke Mende)关于绿党建党历史的专著也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及分析。参见Silke Mende, „Nicht rechts, nicht links, sondern vorn“ — *Eine Geschichte der Gründungsgrünen*, Oldenbourg: De Gruyter, 2011。在中文文献中,可以参考郇庆治、王芝茂的专著。参见: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王芝茂:《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关于德国政党及德国绿党,参见伍慧萍:《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1990-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88-94页。

下崛起的原因：绿党拥有气候政治的议题所有权，近几年全球尤其是欧洲的气候政治议题地位的提升为绿党崛起提供了有利机会，而绿党也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展开行动以赢得选民的青睐。^① 此分析一方面强调了绿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绿党自身的政治行动能力。学者朱美荣从类似的切入点展开分析，阐明绿党从边缘小党成长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执政党的诸多原因，这些原因除了外部环境提供给绿党的有利土壤，还包括绿党政策纲领关注气候环保的时代精神和选民需求、其政策机制灵活务实且善于抓住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等。绿党发展势头一度迅猛的因素从以上多个维度得到了较好的分析。^②

国内学界除了上述关于德国绿党发展崛起原因的分析，还有一类研究是将国际上的绿党，特别是欧洲绿党作为一个政党大类，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综合特点及其生态理论进行分析。例如学者郁庆治的专著《欧洲绿党研究》和刘东国的《绿党政治》。对于绿党的发展变化，主要将其放在西方新社会运动及欧洲绿党政治的大框架下进行分析，将其归类为“运动型政党”^③。

国外学者关于德国绿党的研究从其成立之初即已兴起。自上世纪 80 年代德国绿党成立并且迅速进入联邦议院以来，学者们对绿党的研究兴趣一直浓厚。关于绿党发展及转变的研究主要可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从政党类型学看绿党变迁。关于绿党是否成为全民党（Volkspartei）的讨论的出发点便是政党类型学。政党类型学分析路径之一是历史主义路径。^④ 最完整尝试该路径的是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佩特·梅尔（Peter Mair），两人在奥托·基希海姆（Otto Kirchheimer）提出的“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概念基础上，^⑤ 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政党变迁模式来描述两百年来的政党发展史。根据

^① 杨解朴：《碎片化政党格局下德国绿党崛起的原因及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第136-143页。

^② 朱美荣：《从边缘到中心：德国绿党的崛起与发展前景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10期，第65-74页。

^③ “运动型政党”这一称谓由赫伯特·基奇特（Herbert Kitschelt）提出，指从欧洲新社会运动中产生的区别于传统政党的左、右翼的新型政党。参见高奇琦：《欧洲运动型政党产生的政治文化分析——后现代价值与多元主义的双重路径》，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5期，第6-11页；轩传树：《从运动型到体制化：欧洲绿党发展进程研究》，载《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5期，第79-87页。

^④ 高奇琦：《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历史主义与整合主义的新发展》，载《探索》，2011年第6期，第53-58页，这里第54页。

^⑤ 德裔美国政治学家基希海姆在1965年和1966年分别用德语和英语发表了《西欧政党体制的结构转型》一文，首次阐述了 Catch-all Party 的理论。基希海姆通过分析西德政党体制，特别是将德国基民盟（CDU）作为实证分析对象，结合西欧战后经济和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判断得出以前传统的群众整合党转变为了全方位政党，且后者具有以下特点：1. 削弱长期的意识形态定位，优先考虑短期策略；2. 放弃特定教派或阶级的选民定位，选举宣传向所有选民开放；3. 党内高层和精英的个人影响力增强，出现明显的政治职业化和专业化趋势；4. 普通党员影响力削弱，党员数量下降或停滞；5. 寻求与所有利益集团接触，不与（以下脚注见下页）

该模式,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不同类型的政党,分别是: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根据以上理论,德国绿党经历几十年转变后兼具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一些特点。^①它最终能否归类到这两类政党类型,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②

第二,从社会分歧变化看绿党的发展。根据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坦·罗坎(Stein Rokkan)的社会分歧理论,欧洲的政党制度在19世纪末沿着四组基本的分歧发展,反映了不同有组织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或价值观冲突。这些组织与特定的政策制定者建立联系,这些联系经过长期发展促成了政党的产生。这四组分歧为:中心-边缘;国家-教会;城市与农村(或称工业与农业);资本家与工人(或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③德国传统政党的区分以及选民的分裂可以较好地使用李普塞特理论予以解释。但绿党的成立与发展发生在西方社会出现“价值观转型”和新分歧的背景下,以上四个维度缺乏足够解释力。后来有学者分析,新分歧在于“可持续性-经济增长”^④,或者“传统主义-现代化”^⑤和“全球主义-

(脚注接上页) 特定利益集团捆绑。后来的德国政治学研究者将英语 Catch-all Party 等同于德文的 Allerpartei或者 Volkspartei(中文通常译作“全民党”或者“人民党”)。德国基民盟和社民党被视为传统的全民党。参见:Elma Wiesendahl, *Parteienforschung. Ein Überblick*,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2, S. 121-124ff; Otto Kirchheimer, „Der Wandel des westeuropäischen Parteiensystems“,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Nr. 1, 1965, S. 20-41, hier S. 32-33。

① “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概念由卡茨和梅尔提出。Richard Katz/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Vol. 1, No. 1, 1995, pp. 5-28。关于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参见:高奇琦:《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历史主义与整合主义的新发展》,第53-58页。

② 2021年联邦大选中,绿党不仅从左翼党、社民党,也同样从联盟党和自民党曾经的选民那里获得新的选票。这之后绿党的支持率相对稳定地维持在14%左右。绿党当前优先考虑短期竞选策略,向所有选民开放选举宣传,政党精英影响力增强以及不与特定利益集团捆绑等特征符合基希海姆关于全民党特征的总结分析。德国政党呈现卡特尔化,即逐渐脱离社会基础,向国家靠拢,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政党之间合谋与联盟,德国绿党也身处其中。参见:高奇琦、张佳威:《卡特尔政党模式在德国的兴起及其动因分析》,载《德国研究》,2016年第1期,第16-30页。也有德国学者认为,鉴于绿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作为“环保党”的单议题政党的标签,因此还不能将其归入全方位政党。参见:Eckhard Jesse, „Krise (und Ende?) der Volksparteie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Nr. 26-27, 2021, S. 39-46, hier S. 45。

③ Seymour Martin Lipset/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 1-64。

④ Andreas Stifel, *Vom erfolgreichen Scheitern einer Bewegung*,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S. 35。

⑤ Gerd Mielke, „Gesellschaftliche Konflikte und ihre Repräsentation im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 Anmerkungen zum Cleavage-Modell von Lipset und Rokkan“, in Ulrich Eith/Gerd Mielke (Hrsg.): *Gesellschaftliche Konflikte und Parteiensysteme — Länder- und Regionalstudien*,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01, S. 77-95, hier S. 88。

社群主义”^①，这也是绿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从党纲和竞选纲领变化看绿党的转变。这个角度的主要理论依据来自学者罗伯特·哈默尔(Robert Harmel)和肯尼思·扬达(Kenneth Janda)提出的政党目标与政党转型的整合理论。^② 哈默尔和扬达认为政党转型来自党内团体或被授权个人对政党党纲、组织结构、政党路线和选举策略的改变，因此党纲、竞选纲领、组织结构、政党路线与选举策略等变量是政党转型的指标，另外政党转型还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具体到德国绿党，学者们探讨了绿党在从抗议型政党向有执政能力的政治力量转变的过程中，在意识形态、党派竞争、执政联盟建立和战略灵活性等方面的特点。绿党依靠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灵活性的特点，灵活应对外部压力，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政党体制中发展壮大起来。^③

第四，从政党生命周期分析绿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视角的理论代表是摩根斯·彼德森(Mogens Pedersen)的政党生命周期模型(Lifespan-Modell)和德国政党研究学者奥斯卡·尼德迈耶(Oskar Niedermayer)在对彼德森理论吸收批判基础上形成的新模型。根据尼德迈耶的理论，德国政党的发展有六个阶段：参选、施加竞争影响、进入议会、成为执政联盟考虑对象、参与执政联盟、成为拥有总理职位的主要执政党。目前德国绿党在联邦层面^④处于第五个阶段。

第五，从社会抗争研究视角或者思想对集体行动的驱动作用，分析使绿党从社会运动转变成主流政党的主要推动力。例如，托马斯·凯斯特勒(Thomas Kestler)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绿色思想所具备的获取权力的驱动力，他认为，绿色“思想”作为出发点，也作为实际驱动力，为绿党发展成为主流政党发挥了核心作用。^⑤

相比之下，将绿党与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结合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安德烈·布洛多茨(Andre Brodocz)等学者将德国绿党和绿色和平组织由不同路径

① Gerd Mielke, „It's not dark yet, but it's getting there': Auf dem Weg zu einer ‚critical election‘“, *Forschungsjournal Soziale Forschung*, Vol. 34, Issue 3, August 2021, S. 389 – 403, hier S. 396.

② Robert Harmel/Kenneth Janda,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4, Vol. 6, Issue 3, pp. 259 – 287.

③ 参见 Helge Heidemeyer, „(Grüne) Bewegung im Parlament. Der Einzug der Grünen in den Deutschen Bundestag und die Veränderungen in Partei und Parlamen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 291, Issue 1, 2010, S. 71 – 102.

④ 德国绿党在巴登-符腾堡州已经进入第六阶段。自 2011 年起，绿党执掌巴登-符腾堡州，州长为绿党籍政治人物温弗里德·克雷彻曼(Winfried Kretschmann)。参见：Michael Dürr, *Die Grünen als führende Regierungspartei*,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⑤ Thomas Kestler, *Die motivationale Macht von Ideen — 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Grundlegungen eines ideenbasierten Neoinstitutionalismus*,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2, S. 319 – 322.

对“寡头统治铁律”进行的反思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德国绿党无法摆脱“铁律”,但是它从建党初始就对此进行反思,从规范性方面对党组织规则进行调整,以减缓“寡头化”趋势发展的速度;而绿色和平组织是从功能性方面进行反思,结果反而加速了组织的“寡头化”趋势。^①

本文预设的关于绿党逐渐“寡头化”的判断主要从政党社会学角度出发,以米歇尔斯关于组织及政党的“寡头统治铁律”为依据,同时也结合政党类型学、西方议会民主制等研究来印证绿党的发展转变。本文以“寡头统治铁律”为视角有一个重要原因:绿党从成立之初就严肃地反思了“寡头统治铁律”,试图跳出其窠臼,因而也非常有针对性地从政党组织方面,且兼顾大众心理等因素制定了诸多与其他传统政党迥异的原则和机制,根本目的就在于扩大基层权力,避免本党出现“寡头化”趋势,防止权力被党内机构和个人垄断,但到目前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

之所以选取这个视角,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以下两点考虑,也可以视为本文研究的意义之所在:其一,德国绿党是所谓“时代精神之政党”^②,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变化在政党体制中最鲜明的反映之一。通过分析它的变化可以窥见德国社会乃至西方现代社会的变化趋势。这个观察同样适用于当前引发德国政坛震动和不安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和新成立不久却在东部三个联邦州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瓦根克内西特联盟(BSW)^③;其二,“寡头统治铁律”是百年前基于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成果,德国绿党成立之时,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验证该铁律在绿党身上的适用性有助于加深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和西欧政党体制的认识。

^① Andre Brodoczl/Anne Pintzl/Thomas Schmelzer, „Versuch über die Grenzen eines selbstreflexiven Umgangs mit dem ehernen Gesetz der Oligarchie — ein Vergleich zwischen Greenpeace Deutschland und den Grünen“, in Harald Bluhm/Skadi Krause (Hrsg.), *Robert Michels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2, S. 276 – 292.

^② Jens Berger, „Grünen-Dämmerung — der Zeitgeist-Partei ist der Zeitgeist abhanden gekommen“, 2024 - 09 - 26, <https://www.nachdenkseiten.de/?p=121973#:~:text=Die%20Gr%C3%BCnen%20verlieren%20die%20Jugend.%20Schon,> 访问日期:2024 - 09 - 26。

^③ 德国选择党在当前最新的德国民调中跻身两强,仅次于联盟党。在近期东部联邦州图林根州大选中甚至以 32.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最大政党,在 2024 年 9 月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州的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均获得第二多选票,其票数与第一名几乎并驾齐驱。选择党已经首次进入县镇一级政府,2023 年 6 月 25 日选择党候选人在东部联邦州图林根州松讷贝格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获胜,成为德国首位选择党地方执行官。2023 年 7 月 2 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小城选出了首位选择党籍市长。选择党取得的以上成功引发了德国政坛震动。„Wie umgehen mit den AfD-Erfolgen?“, *tagesschau.de*, 2023 - 07 - 07,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innenpolitik/afd-erfolge-deutschlandtrend-100.html>, 访问日期 2023 - 07 - 08;《首次地方执政极右翼崛起冲击德国政坛》,新华网,2023 - 06 - 27, http://www.news.cn/world/2023-06/27/c_1129719513.html, 访问日期:2023 - 07 - 08。

二、“寡头统治铁律”及其相关理论

100多年前，米歇尔斯通过考察德国社会主义政党（主要是德国社民党，简称SPD，米歇尔斯本人也曾经是德国社民党重要成员之一）的发展实践，提出并论证了现代民主制度中政党的“寡头统治铁律”，这一铁律从此成为政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分析原理，也成为后来许多学者分析官僚政治、组织行为、政党以及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主导框架之一。米歇尔斯的研究深受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以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影响。他与前两位一起被后来研究者归入“精英民主理论家”的代表人物行列。^①米歇尔斯并非首位提出政党组织具有寡头倾向的学者。俄罗斯学者莫伊塞·奥斯特罗戈斯基（Moisei Ostrogorski）在1902年出版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一书中就指出，“政党的寡头倾向损害了政党追求民主的初衷，削弱了政党作为民主政治工具的功能”。^②米歇尔斯的著作相比奥斯特罗戈斯基的著作更为经典，对后世影响更大。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在“寡头统治铁律”中，米歇尔斯认为，组织基础在根本上具有保守性，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任何具有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现代组织都无法避免权力逐步集中于少数人手里以及民众与其政治领袖脱离的“寡头统治”的宿命，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党也同样如此。它并非取决于政党的信仰和纲领，而是由个体与大众心理、政党组织形式以及现代民主的性质决定的。

米歇尔斯认为，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这是因为：第一，组织是当选者对选民、被委托者对委托者、代表对被代表者的统治权的来源；第二，具有社会政治目标的组织一旦要成为政党，必然出现功能分化、专业化和复杂化，这样的技术化分工和组织化分层导致基层民主事实

^①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本文在不同地方引用了该著作的两个不同中文译本，另一个版本为[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杨军/陈秋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两者除了翻译语言表达不同之外，区别在于，前者有译者的长篇前言，后者有译者绘制的图表。在两个版本均包含的内容里，本文主要引用的是2004年版。

^② 转引自叶麒麟：《寡头抑或民主：政党组织结构的属性定位争论》，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12-118页，此处第114页。关于奥斯特罗戈斯基和米歇尔斯的政党批评理论及其学术背景亦可参见 Rolf Ebbighausen, *Die Krise der Parteiendemokratie und die Parteiensoziologie, Eine Studie über Moisei Ostrogorski, Robert Michels und die neuere Entwicklung der Parteienforschung*, Berlin: Duncker u. Humblot, 1969。

上无法实行,最终形成党内领导专权;第三,政党组织形成职业领袖和职业政客后,他们的权力会进一步得到加强,领袖群体逐渐蜕变为一个封闭的特权等级;第四,理论上,大众可以通过选举来解职和更换领袖,但事实上,领袖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如图1所示,米歇尔斯从个体心理、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智识因素三个方面对大众心理、领袖个体以及组织自身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群体的乌合化”导致组织内出现职业领导人;感激之情、大众对领导的心理和智识需求、对公共舆论的畏惧促使专业领导层形成并趋于稳定;领导个体权力欲望、个体自身具备的突出才能加上组织的专业化转变造就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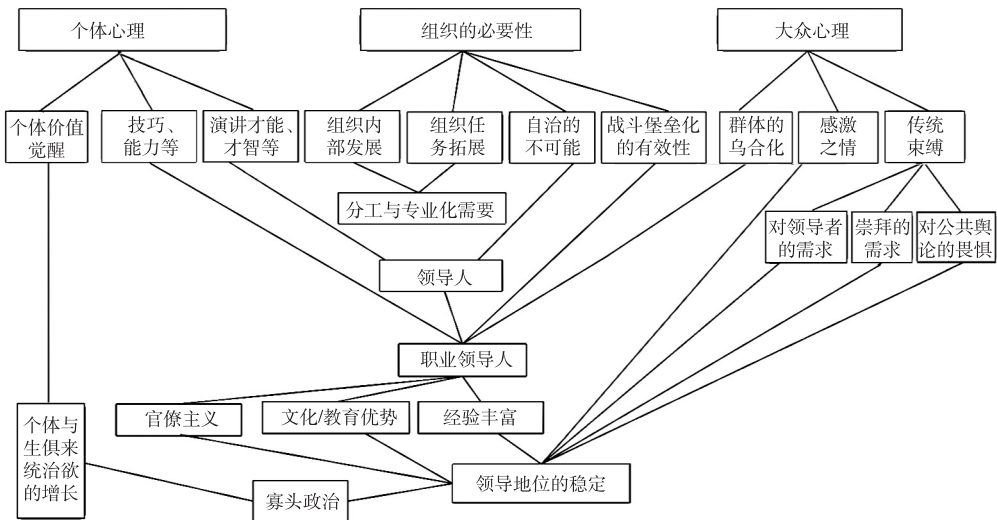


图1 西方民主政党“寡头化”理论推导图

来源:[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杨军/陈秋丰译,第311页。

(二)代议制民主与政党“寡头化”

米歇尔斯从组织必然走向“寡头化”的判断出发,推导出政党组织必然“寡头化”。理解这个逻辑需要有一个认识前提,即:政党政治的变化推动政党自身的变化,而西方代议制民主对西方政党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构建作用。代议制民主中的“非民主”因素是导致政党“寡头化”的重要外部制度性因素。

西方代议制民主从概念到实践都始终存在民主和非民主的内在张力。^①关于

^① 丁辉:《走向“弱竞争民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嬗变与代议制民主的危机》,第51页。

西方民主实质的认识则在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中有透彻分析与深入论证。1942年，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民主理论，对后来的政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熊彼特的基本观点是：现实政治中不存在古典民主学说中的民主制度。^② 理想主义(语境下)民主的首要目的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相信民主主义方法能保证按照人民的意志去决定问题、制定政策；而现实中的民主则是把选举出做决定的人作为第一要义，即民主的实质是政治领导权的竞争，人民的作用是产生政府。正常情况下，选民除了拒绝再选同样的政治领袖或者再度选出支持他们的议会多数外，不能以任何方法控制他们的政治领袖和政府。^③ 基于以上认识，熊彼特认为，政党并不像古典民主学说所要求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意图“按照全体党员一致同意的原则”增进公众福利的集体，而是其成员意图在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协同行动的一个集团，该集团几乎完全通过接受领导而展开行动，因此，“每个政党首先而且主要的目标是要压倒别的政党，以便执掌政权和保持政权”。^④

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确立了西方民主理论的全新内核，他指出，西方民主的“真实”状态就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决定的权力”^⑤。从他以后，西方民主理论逐渐将政治精英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状态定义为唯一现实可行的民主政治形态，^⑥代议制民主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它通过政党政治来平衡指令委任(imperative mandate)和自主委任(free mandate)之间的非民主与民主成分。^⑦ 因此，代议制民主实质是人民赋权、精英当权的精英民主，它在事实上被简化为围绕着代表权竞争而展开的政党民主。^⑧ 政党必须谋求尽可能多的选票，在政党竞争性选举中获胜，才能拥有对国家治理的政治权力和控制力。为了在政党参与党派竞争、获取权力的过程中提高组织行为的效率，“寡头化”成为了政党组织

① 在英美学术圈内，熊彼特关于民主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对规范持批判观点的政治学中。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② 关于古典民主学说，除了熊彼特的经典论述，还可以参见[美]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340页。

④ 同上，第338、349、354页。

⑤ 同上，第396页。

⑥ 胡淑佳：《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建构过程与逻辑方法》，第125页。

⑦ 丁辉：《走向“弱竞争民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嬗变与代议制民主的危机》，第51页。

⑧ 同上，第52页。

发展的必然。

熊彼特和米歇尔斯的观点相互支撑、相互印证,适用于批判性分析当前西方普遍实施的代议制民主中的政党政治。

(三)“寡头统治铁律”广泛有效

德国社民党是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的实证分析对象,与当时德国的保守党不同,作为革命性政党的德国社民党从其产生的目的到纲领,都是对“寡头化”倾向的否定,或者说它就是为了反对寡头而成立的,然而即使这样,德国社民党内部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寡头化”现象,这进一步印证了“寡头统治铁律”。事实上,米歇尔斯的研究重点就在于,如何解释民主政党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与其宗旨相悖的“寡头化”倾向(见图1)。

米氏的判断和分析适用于历史悠久的政党。历史上,德国传统政党最先都是由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运动组织或特定组织经由复杂化和专业化过程而形成政党组织,从而在政治系统中获取更多权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政党都从最初的“世界观政党”(Weltanschauungspartei)^①转变成“仅仅旨在为其领袖获得政权,以及让它们的班子占领行政管理机构的各种职位”的政党,并且在党内形成了寡头政治统治。韦伯将这类政党称为“荫庇政党”(Patronage-Partei)^②。

当然,仅仅具备获取权力的意愿还不够,只有既拥有这个意愿、又有能力实现向普通政党转变的政党,才有可能在政治体制内获取更多权力。要向普通政党成功转变,政党领袖就必须能够适时把握政党权力导向和价值导向,并在两者之间灵活切换。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社会运动和组织仅能获得有限权力和短期政治影响力,而未能转变为更具长期政治权力的政党的关键原因。以二战以后的和平运动为例,它也是众多社会运动中的一种,参加其中的人数可以高达数百万人,但是它一直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形式,影响力也很有限。

米歇尔斯的政党理论形成于1911年,其实证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当时的德国社民党,此后的学者不乏针对这一理论的质疑。建构主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前者的研究主体具有自我反思性,主体在对例如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等问题的反思过程中,会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③也有学者认

^① “世界观政党”是指具有很强烈阶级利益特性的政党。在19世纪德国政党开始形成时期,老的保守主义,老的自由主义和老的资产阶级民主,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天主教中央党等都是这类政党的典范。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9页。

^②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第316页。

^③ André Brodocz/Anne Pintz/Thomas Schmelzer, „Versuch über die Grenzen eines selbstreflexiven Umgangs mit dem ehernen Gesetz der Oligarchie — ein Vergleich zwischen Greenpeace Deutschland und den Grünen“, S. 279.

为其论断过于宽泛，且只考虑了政治输入而没有关注输出。

但是时至今日，这个论断的广泛有效性不论是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还是在政治实践中都无法真正被推翻，而且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中还不断出现新的语言和概念来论证这个老命题，例如“代表制悖论”^①“委托-代理理论”^②等等。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瑞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于1951年也曾断言：“各党派的领导层本身倾向于采取一种寡头形式。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因此形成，[这是]一个或多或少封闭的种姓，一个难以进入的内部圈子。[……]理论上，选举能够阻止出现寡头统治，实际上，它却更有利于寡头统治。”^③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党的组织结构在向更为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迪韦尔热认为“寡头统治铁律”仍然成立。

德国政治学家及政党研究学者乌尔利希·冯·阿勒曼(Ulrich von Alemann)在其关于德国政党体制的经典教科书中认为，“至今不论是在政治社会学还是在政治实践中都无法绕开该论断(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④2012年，德国学者在探讨米歇尔斯理论的论文集中，再次论证了“寡头统治铁律”对当前西方政党体制的现实性和有效性。^⑤在现代政治体制中，政治统治必须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政党是现代政治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⑥，政党始终为“谋取政治控制而斗争”^⑦，政治控制的权力必须通过政党来传递。而任何政治性组织若想要在政治系统内获取更多权力，首先需要成立政党，进入政党体制参与政党竞争性选举。而其一旦进入政

① 参见 David Lublin, *The Paradox of Representation: Racial Gerrymandering and Minority Interests in Congr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李永刚:《多元利益诉求下的信任危机——西方“代表制”的现实困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6年第6期,第56-62页; 聂智琪、谈火生编:《代表理论:问题与挑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陈明明、陈远星:《代议制政府与代表制政府:一个理论和历史的比较》,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第78-90页。

②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最初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用于研究企业经营问题。20世纪80年代,该理论被引入政治学领域,用于研究公共官僚、选举、政治决策和国际组织等。参见张雪:《国家与国际组织互动关系的“委托-代理”解释框架》,载《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1期,第119-130页,这里第121-122页。

③ Maurice Duverger,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Sigfried Landshut*, Tübingen (franz. Originalausg. 1951), 1959, S. 166. 转引自 Andreas Stifel, *Vom erfolgreichen Scheitern einer Bewegung*, S. 66。

④ 参见 Ulrich von Alemann, *Das Parteiensystem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 166。德国学者关于德国政党党内民主与“寡头统治铁律”的最新研究,参见 Tom Mannewitz/Wolfgang Rudzio, *Das politische System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2, S. 141-152。

⑤ 参见 Harald Bluhm/Skadi Krause (Hrsg.), *Robert Michels'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Oligarchien und Eliten — die Kehrseiten moderner Demokratie*,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2。

⑥ 张春满:《西方政党理论的演进轨迹》,载郭定平:《政党政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1-55页,这里第45页。

⑦ 同上,第46页。

党体制,就必定形成“寡头统治”,这既是政党谋取政治控制权力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必然结果。

现代的“寡头统治”并非仅有弊端,李普塞特就认为,“许多内部结构呈现强烈寡头化倾向的组织,却为整个社会实现民主提供了基础,并能够保障其成员的利益免受其他群体的侵害。”^①政党领袖为了维持领导地位,还是得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大众,以大众的意愿指导行动,同时在形式和宣传上强调民主,尽量掩盖寡头特征,客观上增强了大众的权利意识,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即使米歇尔斯做出“寡头统治铁律”的论断,他也并未对西方民主制持悲观态度,他认为“由寡头控制下的民主政党依然能够在民主意义上影响国家”,在不断对抗“寡头统治”的努力中,民主会获得进步,“民主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它总是在同一浅滩中断,但总能得到更新”。^②

米歇尔斯已经证明,历史悠久的、以革命和民主为建党目标的德国社民党在发展过程中转变为了“寡头统治”的政党。以下要探讨的是:德国绿党这样一个以环保和公民运动起家的、年轻的新型政党发生了哪些趋向“寡头化”的转变,以及其原因何在。

三、德国绿党的目标之变与“寡头化”

在米歇尔斯的分析中,德国社民党的“寡头化”的第一步便是其目标的蜕变,“正是在社会民主党为了生存发展而产生斗争需求时,‘寡头化’倾向才出现”^③。无论哪个组织,随着新的利益和动机核心的形成,组织原来的目标都终将遭到抛弃。^④组织从政党达成目标的手段变成目的本身,为了组织的存续和壮大,官僚精英往往主动或被动地违背组织当初所倡导的原则和目标。随着政党对于稳定的需求逐渐增大,政党的“革命性”锋芒日渐流失,最终走向保守,或者如人们习惯的说法——“在政治上趋于成熟”。^⑤

绿党的发展目标从建党之初的“院外反对派”“反政党的政党”(Anti-Parteien-Partei)转变为了积极追求政治系统内更大权力的建制派政党。这样的目标转变使得绿党主动融入代议制民主,也令其满足了“寡头化”的前提条件。

①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第29页,第315页。

② 同上,第358页。

③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杨军/陈秋丰译,第390-391页。

④ 同注①,第12页。

⑤ 同上,第323-326页。

(一)从政治运动组织到政党组织

关于德国绿党的成立,国内外学术文献都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德国绿党的形成源自以下三大运动:第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生运动,其政治立场之一是作为“院外反对派”抗议当时的建制派政党和议会制度^①;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于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包括反核电运动(Anti-AKW-Bewegung)、环保运动、和平和女性主义运动;第三,1989-1990年前民主德国的民权运动。^②其中新社会运动是绿党最重要的源头。

德国“六八”运动后,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密集且扩张迅速的基层倡议及公民倡议运动网络,即所谓的“绿色选择”(grün-alternativ)网络。^③但是这个逐渐覆盖全德国的网络却是一个非常异质的政治杂合体,涵盖了以下五类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潮:保守派^④;源自保守革命思想的“集体主义思想”推崇者;在东西方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者;非教条左派,其中包括原教旨派和现实派;信奉马克思主义、推崇共产主义干部组织的K团体(K-Gruppen)。反核电运动和生态运动(Ökologiebewegung)在这个网络中发挥着关键的联接作用,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左右分界,将这个异质的政治杂合体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当时,这些团体都以“倡议”和“运动”的组织形式通过抗议示威、游行和街头宣传等手段施加政治影响,也有参加地方选举且取得成功的组织。尽管如此,是否成立一个全国性绿色政党的问题一直在这些组织中存在巨大意见分歧和激烈

^① 在德国被称为“六八”运动。“六八”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末兴起的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运动,是左翼青年群体主导的社会变革实践,以反对既有权威体系与上一代社会规范为主要诉求。在联邦德国,该运动主要源于对越南战争、阿登纳时期政治管控模式以及纳粹历史处理方式的回应,其核心议题包括反权威、社会民主化(包括高校的民主化)、对纳粹极权的反思、反资本主义和反战等。“六八”运动与“新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尽管它们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两者都深刻地影响了联邦德国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德国“六八”运动产生的许多思想和抗议形式为后来德国的“新社会运动”奠定了基础。

^② 关于“新社会运动”的定义论述可参见 Dieter Rucht, „Neue Konflikte und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 in Brigitte Grande/Edgar Grande/Udo Hahn (Hrsg.), *Zivilgesell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ufbrüche, Umbrüche, Ausblicke*,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21, S. 61-77; Silke Mende, „Nicht rechts, nicht links, sondern vorn“ — *Eine Geschichte der Gründungsgrünen*, S. 37。德国绿党成立于1980年的联邦德国,1990年两德统一后,前民主德国的公民运动组织“联盟90”与西部德国的绿党合并为现在的“联盟90/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因此,这里也将前民主德国的民权运动作为塑造现在德国绿党的运动之一。参见 Frank Decker, „Etappen der Parteigeschichte der GRÜNEN“, 2023-02-06, <https://www.bpb.de/themen/parteien/parteien-in-deutschland/gruene/42151/etappen-der-partiegeschichte-der-gruenen/>, 访问日期:2023-10-08。

^③ 例如各个基层的“绿色名单”或者“彩色名单”组织、联邦环保公民倡议运动联合会(Bundesverband Bürgerinitiativen Umweltschutz, BBU)等。

^④ 代表人物是从基民盟退党的赫伯特·格鲁尔(Herbert Gruhl),他于1978年成立了“为了未来的绿色行动”(Grüne Aktion Zukunft, GAZ)的组织。

争论^①。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下,相当一部分新社会运动组织坚信非传统政党组织和议会外反对力量同样可以改变社会,反权威、反等级、反官僚和直接参与式民主是他们的政治信条。因此,当时德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环保组织、公民倡议运动组织等对于是否成立政党和融入议会体制有相当大的争论。

在1977年前后,德国因为新建核电站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示威活动,甚至在抗议民众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暴力流血冲突^②。为了获取更多政治影响力和权力以参与地方性决策,一些运动组织开始尝试参加地方性选举。他们认识到,公民运动可以拖延甚至阻止几座核电站的修建,但是真正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通过议会来实现。1977年在下萨克森州成立的“环保绿色名单”(GLU)作为首个绿色团体参加地方选举,一年之后又参加州议会选举,获得了3.9%的支持率,令人瞩目。这类团体主要由倾向保守派和市民阶层组成。此外,在大学城活跃的更多是左倾的“彩色名单”(BuLi)和“选择名单”(AL),它们为了实现比环保话题更广泛的新政治诉求,也参与了议会选举。1978年,“彩色名单”在汉堡州议会选举中获得3.5%的支持率。^③首次进入联邦州议会的是“不来梅绿色名单”(BGL),1979年它以5.1%的得票率进入州议会。^④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具有更大政治抱负的运动组织于1980年正式组建了联邦绿色政党,即绿党,并于1983年以5.6%的得票率首次进入联邦议院。由此,抗议组织以为通过政治运动就能获得权力、不用进入议会就能实现政治纲领的信念被彻底打破。

尽管德国绿党成立了全国性政党,并随后进入联邦议院,但是成立之初,绿党的设想是在运动组织和政党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展现“兼具议会反对派运动和议会制政党”的两面,其立足点是新社会运动,政党组织仅仅作为有益补充服务前者。^⑤即使作为一个政党,绿党当时也明确与其他议会政党划清界限,要成为一种“全新

① 参见 Silke Mende, „Nicht rechts, nicht links, sondern vorn“ — Eine Geschichte der Gründungsgrünen, S. 322 – 364。

②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巴登-符腾堡州的维尔(Why)和下萨克森州的格罗恩德(Grohnde)的反核电运动。

③ 更多关于成立政党的争论可参见 Silke Mende, „Die Alternative zu den herkömmlichen Parteien“. Parlamentarismuskritik und Demokratiekonzepte der Gründungsgrünen in den siebziger und frühen achtziger Jahren“, in Thomas Bedorf/Felix Heidenreich/Marcus Obrecht (Hrsg.),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e. L'avenir de la démocratie*, Berlin: LIT, 2009, S. 28 – 50, hier S. 28 – 29。

④ 与其他大城市的名单组织相比,“不来梅绿色名单”较为特殊,因为它更多是倾向于市民阶层的。

⑤ 关于绿党对普通政党及社会运动身份的认同,绿党早期领袖人物佩特拉·凯丽(Petra Kelly)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绿党在议院中只是作为“虚立腿”(Spielbein),它的议院外运动才发挥着“支撑腿”(Standbein)的作用,前者要为后者服务。参见 Jens Siegert, *Wenn das Spielbein dem Standbein ein Bein stellt. Zum Verhältnis von Grüner Partei und Bewegung*, Kassel: Weber, Zucht & Co., 1986。

的政党类型”^①，坚持将自己定位成“反政党的政党”和“迥异于传统政党的另类选择”^②。

(二)现实派战胜原教旨派

德国绿色和公民倡议组织在从社会运动到全国性政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现实派和原教旨派两大派别。原教旨派绿党领导人对绿党参与议会政治持根本怀疑态度，他们反对以任何形式参与执政。现实派坚信，绿党只有融入议会体制，在政党竞争中追求尽可能多的选票、赢得选举，才是绿党存续和发展的唯一途径。

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规模越大，其代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③ 像德国前副总理约希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这样的绿党现实派领导人，不论他做出怎样与绿党原则以及与自己以前主张背道而驰的决定，不论媒体对他的指责有多严厉、党内部分基层党员的不满有多大，他都能继续留在党内左右绿党的决议，因为彼时的绿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目标替代阶段，政党目标聚焦于进一步获取权力，赢得更多选票。只要有人物对此有帮助，政党都会表示欢迎，它不排斥与它在世界观上有分歧的人，但是会排斥事实上的政治对手，因为后者也为了相同的目标——获取权力而与之竞争。^④

绿党自1980年建党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党内现实派击败原教旨派的整合过程，领导集团内的左右极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被过滤出去，一个路线相对统一的、以追求议会多数和攫取政治权力为最终目标的领导集团逐渐形成。1988年绿党全国党代会上，联邦执行委员中的原教旨派领导层落选，遭遇其建党以来最大的失败，这是党内现实派阵营开始走强的重要标志。

1990年绿党在联邦大选中惨败，没有跨越5%的门槛线，未能进入联邦议院，当时甚至有专家预言，绿党从此将从德国政党体制中消失。^⑤ 这次选举是绿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组织生死存亡之际，党内现实派乘机积蓄更大力量，最激进的派别退出绿党，之后绿党确立了专业化和组织改革的方向。^⑥ 1994年大

^① Silke Mende, „Nicht rechts, nicht links, sondern vorn“ — Eine Geschichte der Gründungsgrünen, S. 460.

^② 绿党1980年建党时的党纲前言的开篇首句即是“Wir sind die grundlegende Alternative zu den herkömmlichen Parteien”(我们是迥异于传统政党的另类选择)。Die Grünen, *Bundesprogramm*, 1980, S. 4, http://www.boell.de/sites/default/files/assets/boell.de/images/download_de/publikationen/1980_001_Grundsatzprogramm_Die_Gruenen.pdf, 访问日期:2024-01-03。

^③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第155页。

^④ 同上，第322-324页。

^⑤ Jürgen Hoffmann, *Die doppelte Vereinigung: Vorgeschichte, Verlauf und Auswirkungen des Zusammenschlusses von Grünen und Bündnis 90*,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1998, S. 9.

^⑥ Markus Klein/Jürgen W. Falter, *Der lange Weg der Grünen: eine Partei zwischen Protest und Regierung*, München: C. H. Beck, 2003, S. 62.

选后,绿党重返联邦议院。1998年绿党与社民党组成红绿联盟执政联邦政府,现实派阵营进一步巩固。

在现实派逐渐占据党内上风的过程中,很多建党时期的党员对绿党的蜕变感到不满和失望,主动退党,而新招募的党员对绿党初期坚持的新社会运动原则感到陌生,难以形成认同感。被迫和主动离开绿党的成员^①尝试继续坚持绿党最初的政治理念,他们要么在地方层面借助其他组织形式施加影响,要么成立新的政党,例如生态民主党(ÖDP),但这样的组织和小党始终无法形成与绿党抗衡的大气候,更无法获取较多权力以贯彻本党意志。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组织和小党拒绝成为常规主流政党,也就意味着它们关闭了通向权力之路的通道。绿党现实派将绿党带上了向“寡头政治”发展的方向,同时,得益于现代大众媒体的作用,“寡头政治”反过来又继续增强现实派领导人的力量,突显他们的领导作用。

2017年秋季的联邦议院大选中,绿党既没有获得与之前民调高支持率相匹配的得票率,也没能如愿进入联邦政府,绿党党内从基层到领导层都深感失望。这次大选后不久,2018年初,绿党选出了两名新领导人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和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两人均是党内现实派代表,这打破了之前一直以来两名党领导人分别来自现实派和原教旨派阵营的惯例。他们甚至获得了党内基层的广泛支持,因为基层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带领绿党以“前所未有的团结面貌”向着成为执政党的目标努力。

现在的绿党不再用现实派和原教旨派来区分党内不同阵营,而是用现实派和左派,^②因为绿党内部早已就追求权力目标达成共识。即使使用现实派和原教旨派话语,其内涵的主要差异已经转变为竞选策略的差异和执政结盟的不同倾向。^③

绿党目标的改变既是其“寡头化”趋势发展的第一步,也是其作为政党组织存续、发展的必然一步。随着目标的变化,为了提高组织运作效率、让组织存续和壮大,一些具体组织原则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四、德国绿党的原则之变与“寡头化”

绿党作为“反政党的政党”成立后,最初也曾有目的地试图通过组织性和制度

^① 建党之初的领袖人物,如保守阵营的赫伯特·格鲁尔和极端左翼阵营的尤塔·迪特福尔特(Jutta Ditfurth)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退党。

^② 伍慧萍:《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1990-2021)》,第94页。

^③ Frank Decker, „Die Organisation der GRÜNEN“, <https://www.bpb.de/themen/parteien/parteien-in-deutschland/gruene/42156/die-organisation-der-gruenen/#:~:text=Von%20Rotationsreg elungen,%20% C3% B6ffentlichen% 20Fraktionssitzungen,% 20ehrenamtlichen% 20Partei% C3% A4mtern,> 访问日期:2024-05-18。

性安排来预防或者规避本党沦为所谓的常规议会政党。绿党用于规避“正常政党化”的预防性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基层民主或者说“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中。^① 1980年它将基层民主作为本党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写入首部党纲。^② 但事实上，绿党的基层民主原则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就在政治现实中发生动摇，直至彻底空心化。

绿党在使用基层民主这个概念的时候，一方面是由于建党的初心，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将自己与代议制民主中的建制派政党区别开来，对代议制民主加以否定但它在实际中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的定义。基层民主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发展而来。根据绿党最初制定的相应机制可以将这个原则的核心总结为：基层党员的决议优先于党领导层的决议；基层单位获得广泛自治权和行政管理权；确保所有层级的每位党员最大程度地参与民主决议；确保党内基层始终监督所有党内干部、议员和党的机构；党组织和政策对所有党员和拥护者完全透明化。^③ 围绕这些基本内容，绿党在成立之初制定了以下具体规章制度，试图藉此维持基层民主原则，杜绝领导与普通党员的分化。

（一）指令议席制(Imperatives Mandat)^④

指令议席制是对代议制和政党组织在实践中最根本的“侵犯”^⑤。绿党认为，既然在实践中干部和议员代表制无法避免，那么至少必须确保议员与党的基层紧密联系。指令议席制的核心要素是绿党议员可以随时被撤选下来。如果绿党议员在议会中的表决与本党基层的决议和意见不符，那么其议员资格将被撤销。该制度的目的是防止议员只听命于党内领导和精英，而不代表普通党员的利益。但是此项措施违反了德国《基本法》^⑥。指令议席制的失败除了违宪还有其他原因，主要是其在实际中难以操作，缺乏灵活性，让协商变得拖沓。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制度不利于组织本身，如果随时撤销绿党议员资格，那么必然会威胁到原本就人数稀少的绿党议会党团的地位。

^① Die Grünen, *Bundesprogramm 1980*, S. 5.

^② 1980年，绿党成立时的第一部党纲中将绿党定义为“生态的、社会的、基层民主的、非暴力的”政党。这个四点被视为绿党四项基本原则。Die Grünen, *Bundesprogramm 1980*, S. 4-5.

^③ Die Grünen, *Bundesprogramm 1980*, S. 5.

^④ 前文引用的文献中，丁辉将此德文概念对应的英文表达译为“指令委任”。参见丁辉：《走向“弱竞争民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嬗变与代议制民主的危机》，第51页。

^⑤ André Brodocz/ Anne Pintz/ Thomas Schmelzer, „Versuch über die Grenzen eines selbstreflexiven Umgangs mit dem ehernen Gesetz der Oligarchie — ein Vergleich zwischen Greenpeace Deutschland und den Grünen“, S. 283.

^⑥ 德国《基本法》第38条规定，“联邦议院议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受任何指示和委任的约束，而只遵从自己的良知。”

(二) 议员定期轮值制 (Rotationsprinzip)

该制度规定,绿党议员在任期过半后——通常是两年后,改由候补名单中的人选完成下一半任期,候补人员一般是与议员共事的议员助手。另外,所有党内职务都有任期限制,当选的官职只能连任一届。这个原则的目的是,一方面,避免个人从领导权力中获得长期愉悦感,杜绝议员因贪恋声望和权力而长期掌握权力,防止基层与精英之间出现断层;另一方面,让尽可能多的党员参与议会的决策过程。在绿党引入轮值制之初,该制度也被质疑违宪,违宪原因与指令议席制类似,即轮值制损害了议员的自由意志。1984年3月,德国绿党做出欧洲议会绿党议员定期轮值制的决议(担任半个任期);1985年3月,德国绿党党代会做出绿党联邦议员轮值制的决议。绿党的轮值制首先在联邦州层面,之后才在联邦层面实施,但是不久轮值制在联邦层面就被“再次当选禁令”代替,而仅在联邦州层面存在,即使在联邦州,它的实施也并不统一。1991年4月,在绿党党代会上,轮值制被取消。^①

(三) 公开透明制

该制度强调,全体党员都参加决议大会,所有讨论决议程序对全体党员完全公开。与传统政党不同的是,绿党最初召开的不是代表大会,而是成员大会。为了保证所有成员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绿党在控制议程与发言时间等方面对大会程序做出特别规定,例如通过抽签决定发言者的顺序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尽可能不加过滤地反映党基层、普通党员的意愿。这样,即使出现了米歇尔斯断言的领导人与大众之间智识鸿沟越来越大的现象,大众仍可以起到直接监督的作用,基层也因此有机会随时参与党以及议会党团的会议。

公开透明制在绿党1998年进入联邦政府之初还继续实行。绿党议会党团的会议刚开始是完全对外开放的,但是之后要求外部参会者事先在议会党团进行详细的登记。即使普通党员可以任意出入这些会议,但其实他们并不会这么做。原因是,一方面,有正常职业的普通绿党党员一般没有时间每周在上班时间去参加绿党议会党团的会议;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起了重要影响:普通党员们很容易感觉自己是不速之客,尤其感觉他们在政治领域与职业政客之间的专业素质相差很多,从而觉得自己在这些会议上显得尴尬和不合时宜。参加决议大会和参与讨论程序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在享有权利的人中,真正对公共和政治事务感兴趣的本来就并不多,因此放弃这些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愿行为。这是所有现代民主政党的共性,绿党也不例外。

绿党在1980年、1993年、2002年和2020年先后制定了四版党纲。在1993年

^① Silke Mende, „Von der ‚Anti-Parteien-Partei‘ zur ‚ökologischen Reformpartei‘“,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52, 2021, S. 273–315, hier S. 285.

的党纲中，“基层民主”不再是该党基本价值观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民主”。2002年版的党纲里出现“民主即是基层”。在2020年第四版党纲中，“民主即是基层”又被从关于基本价值观的表述中删除，再次以“民主”代之，而且特别强调了“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性。^①

至此，绿党成立40多年后，旨在坚持基层民主、防止“寡头化”的原则和措施要么被抛弃，要么流于表面形式。基层民主妨碍了政党的运作效率，在绿党组织结构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中，它已经“沦为象征政治”^②，基层失去了对所有党员干部和绿党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能力。绿党声称全体基层党员可以任意推选联邦大选首席候选人，而事实上，默默无闻的候选人在政党领袖面前没有任何获胜机会可言。和其他政党领袖一样，在政党活动或重大决议中，绿党领袖在遇到阻力时，会以比如私人原因为由提出辞职，实际是变相通过辞职施加压力，或者体现自己的不可或缺性。可见，绿党的政治实践再次证明党内基层对政党领袖影响力甚微。

五、德国绿党组织之变与“寡头化”

绿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组织变革的历史。^③随着绿党基层民主原则的空心化，领导与大众、高层与基层分化加剧，领导层发生转变，这些转变恰恰是绿党成立之初极力想规避的其他常规政党的弊端，包括：政党代表精英化，政党领袖权威化，脱离基层群众，以及政党干部集团化。^④

米歇尔斯认为，随着组织机构规模增大、组织财源扩充、组织的宣传机构加强，普通成员对组织的控制力日益削弱，组织领导的绝对权力不断增大。按照原有的组织设定，组织领导者所有行动都处于普通成员的监督之下，但是随着组织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监督逐渐趋于表面化，组织的普通成员不得不放弃行使监督整个管理过程的权利，转而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可以信赖的领薪官员。官僚化和领导人职业化使党内民主走向末路。同时，政治人物的个人化和精英化加深了领袖的影响力，

^① 绿党的四版党纲原文见伯尔基金会网站，“Programmtexte Bündnis 90/Die Grünen”，<https://www.boell.de/de/2008/08/08/programmtexte-buendnis-90die-gruenen#:~:text=40%20Jahre%20gr%C3%BCne%20und%2030%20Jahre>，访问日期：2024-05-18。

^② Silke Mende, „Nicht rechts, nicht links, sondern vorn“ — Eine Geschichte der Gründungsgrünen, S. 462. 关于象征政治可参见 Murray Edelman, *Politik als Ritual. Die symbolische Funktion staatlicher Institutionen und politischen Handelns*, Frankfurt/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76。

^③ Donatella Campus/Niko Switek/Marco Valbruzzi,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Divided Power in West European Parti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71.

^④ Silke Mende, „Nicht rechts, nicht links, sondern vorn“ — Eine Geschichte der Gründungsgrünen, S. 458-482.

并使权力更为集中。

(一) 职业化与官僚化

初期的绿党制定了无薪酬志愿原则和津贴限制原则,即绿党党内政治职务遵循无薪酬志愿者原则,对绿党干部和议员的收入规定上限。根据该原则,绿党联邦议员的收入不能高于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①,其法定收入中高出的部分须上缴给所谓的“生态基金”(Öko-Fond),用于资助与生态保护和基层民主相关的项目和倡议。绿党议员不允许作为咨询专家受雇于私营企业,这一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党员出于功利目的而不是为了共同利益和政治理想从政,以及防止形成党内高薪干部阶层和职业化党员干部。

如今绿党党内高层职业从政人员的收入已增加到与其他政党无异。以曾担任绿党主席和联邦部长的于尔根·特里廷(Jürgen Trittin)为例,即使有轮值制、无薪酬志愿和津贴限制原则,特里廷从1982年起就已成为专职政客。2022年1月,绿党联邦执行委员会曾被调查,起因是以绿党外交部部长贝尔伯克和经济部部长哈贝克为首的绿党领导层被匿名投诉获得每人1500欧元新冠特别津贴,尽管后来调查被取消,但是绿党议员的具体收入再次被公之于众,身兼联邦议员与联邦部长的贝尔伯克和哈贝克税前收入大约在每月21000-25000欧元,同时他们作为绿党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另外还有党内特殊补贴,此外贝尔伯克还补充上报了2021年的额外收入25000欧元。^②

不来梅州前州议员保罗·迪芬巴赫(Paul Tiefenbach)在探讨绿党“寡头化”的过程中指出绿党的“国家化”。^③这里的绿党“国家化”是指绿党党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政客和职业政党领袖,他们拿国家薪金,依靠占据议会议席或者担任国家官职而谋生。米歇尔斯认为,职业领袖的出现,会让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鸿沟越变越大,政客的职业化是“寡头统治”的核心之一。除了教育和智识水平、政治演讲能力等因素,成为职业政客后积攒的阅历、人脉、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渠道等等,都让政党领袖与普通党员之间的鸿沟不断拉大,普通党员几乎没有机会获得领袖们从

^① 该原则实施之初,当时的技术工人平均月净工资大约为2100马克。

^② Anne Hund, „Grüne Kanzlerkandidatin Annalena Baerbock: Wie hoch ist ihr Gehalt als Bundestagsabgeordnete?“, merkur.de, 2021-06-17, <https://www.merkur.de/lokales/region-holzkirchen/holzkirchen-ort28831/abgeordneter-gruene-berlin-karl-baer-wie-viel-geld-bekommt-ein-91702596.html>. 访问日期:2023-07-08。自2024年7月1日起,作为普通绿党联邦议员,每月法定税前工资为11227.2欧元,另外还有每月5051.54欧元的免税补贴,以及每年12000欧元办公装备费。Deutscher Bundestag, Sachstand, Vergütung von Abgeordneten des Bundeskanzlers, von Bundesministern und Parlamentarischen Staatssekretären, 2022-08,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905742/9eada7b25c4cf0f562da5cf2b16dc9f1/WD-3-087-22-pdf-data.pdf>. 访问日期:2024-11-11。

^③ Paul Tiefenbach, *Die Grünen: Verstaatlichung einer Partei*, Köln: PapyRossa-Verlag, 1998.

政治实践中获得的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这就巩固了政党领袖的精英地位，增加了他们操纵整个局势的机会和能力。低薪制并不能帮助防止“寡头统治”的形成，因为它不利于政党吸纳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真正优秀的人才为党内工作人员，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寡头集团的形成；同时，由于组织结构的要求、领袖的智识及其从政治实践中获得的技能以及组织本身的心理等因素，领导者日益从普通党员中脱离出来，他们在政党组织中自然产生，原本不领取薪酬的领导者很快便成为职业领袖。^①

（二）个人化与精英化

为了避免政党个人化和精英化，初期绿党制定了两项原则：职务与代表分离制和集体领导制。

职务与代表分离制指的是党内干部职务与议员职务及国家官职分离。根据这项规定，无论是联邦还是州一级的绿党议员，都既不能担任政府职务（部长、国务秘书等），也不能担任党内职务，更不能身兼数职。集体领导制是指，联邦及联邦州一级的党主席由三名成员担任，该职务不称为“主席”，而是“发言人”^②，每位发言人享有同等的权力和权利，任期受到严格限制。此规定旨在让职务、权力和职责分摊到多人，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也希望避免产生因职务与职权集于一身而导致个人在组织中不可或缺的情况。

在行政权和立法权横向分权原则的基础上，绿党又增加了一项原则，即在立法权力机构内部实行议会党团与政党之间的纵向分权原则。这一规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党的基层，使其免受议会工作的职能逻辑对妥协和灵活性要求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党的基层都应保留其独立性。党不应跟从政府或议会党团的路线，以防因同时代表政府立场和本党政策而产生利益冲突。

绿党在实行党内干部职务与议员职务（国家官职）分离时遇到了难题，和其他规定相比，它引发的党内矛盾更多；议会党团和党内领导层是两套班子，机构之间存在摩擦，信息沟通不畅，从而影响到行动协调；由于人员不能两边同时兼职，随着绿党规模扩大，人才难以为继，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降低了组织工作效率；按照绿党的初始原则，议员只能传达、解释党基层的决议，并不拥有影响本党话语的权力，这严重束缚了他们设置有效议题的能力和竞选活动能力，因而激化

^①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第112页，第350—351页。熊彼特在关于民主的论述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各个集体几乎完全是通过接受领导而行动的——这是实际上任何集体行动的主要方法。”参见[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338页。

^② 1991年之后，绿党党主席由三人变为两人，而且必须由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组成。绿党组织结构内的女性配额制既是绿党追求分权也是其追求男女平等的政治诉求体现。与分权相比，绿党在男女平权方面，包括组织内和公职候选人的女性配额制贯彻得更好。但是这个对组织“寡头化”影响较小，因此女性配额制不在此赘述。

了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现实派议员与普通党员和党内原教旨派干部之间的矛盾。

绿党的集体领导制刻意模糊个人形象,这与竞选专业化趋势以及现代媒体社会通过领袖塑造政党形象和传达政治理念的做法相矛盾。党内精英、政党的高级代表才是公众和媒体的焦点,大众媒体基本只会将其中一两个人作为某一政党的代言人,尤其在竞选中,各种采访和电视脱口秀也都只会邀请他们,这增强了领袖的个人化和精英化。媒体传播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催生出了以媒体为导向的“明星政治家”类型,哈贝克和贝尔伯克就属于这类政治家,“个人化战略”也成为绿党在积极参与选战时吸引选票和拉拢选民的重要手段。在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中,时任绿党双主席之一的贝尔伯克参与三名总理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对决,这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关于“政党(专业性的/职业性的)个人化”的讨论。^①另外,在集体领导制中决策参与人数过多、决策过程反复讨论,都造成决策耗时过长、效率低下,这也导致绿党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逐渐弱化集体领导制。^②

尽管有各种限制措施,绿党的议会党团主席实际上仍然成为了绿党具有实际权力的领导人物。事实上,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应为绿党党主席。这里仍然以菲舍尔为例:他从未担任过党主席,但曾担任议会党团主席,在2005年卸任前,他在绿党里的权威和权力无人能出其右,他成为绿党实际的权力核心,在党内专断倾向显而易见,因此还出现了“菲舍尔主义”(Fischerismus)^③的概念。菲舍尔的个人能力和威信足以操纵基层党员的决议。作为绿党现实派掌门人,菲舍尔在红绿联合执政期间,与现实做各种妥协,不怕放弃绿党基层所代表的基本原则,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他在担任德国红绿政府外交部部长兼副总理期间同意德国向科索沃派兵。在做出这个决议前,菲舍尔在党内大会上曾间接地以辞职相威胁。正如米歇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政党活动中,政党领袖只要遇到阻力便会主动提出辞职,表面上宣称自己已经厌倦了领导职务,实际上却是要通过辞职向反对者显示自己的不可或缺性。强势领袖面临基层压力时镇定自若,因为

① Stephanie Geise/Katharina Maubach/Alena Boettcher Eli, „Personalisierung und Emotionalisierung auf Social Media“, in Karl-Rudolf Korte (Hrsg.), *Die Bundestagswahl 2021 — Analysen der Wahl-, Parteien-, Kommunikations- und Regierungsforschung*,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3, S. 445 – 478.

② Saskia Richter, „Führung ohne Macht? Die Sprecher und Vorsitzenden der Grünen“, in Daniela Forkmann/Michael Schlieben (Hrsg.), *Die Parteivorsitzend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 – 2005*,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05, S. 169 – 214.

③ “菲舍尔主义”是指菲舍尔一人独自掌控绿党,他周围还有一群紧密的追随者,都属于现实派的随从,其个人意见对绿党的方针政策影响很大。参见 Joachim Raschke, „Sind die Grünen regierungsfähig? Die Selbstblockade einer Regierungspartei“,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10/2001, S. 20 – 28, hier S. 21.

他们深知即使自己权力受到攻击，也无法真正被动摇。^①

德国绿党的党内职务与国家官职严格分离这一规定经过多年来的逐步松动，于2003年5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绿党修改章程，允许党主席团六名成员中的三分之一同时担任党内职务和议员一职，而投票表决取消这个绿党最初原则的恰恰是其基层党员。即使在2003年之前，这个分离原则的政治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实际执行的意义。2022年1月，绿党曾就回到2003年前更严格的职务与国家官职分离制进行了投票表决，但决议未获通过。

2018年，哈贝克当选为绿党双主席之一，但他在宣布参选党主席时，还担任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环境部部长及副州长的职务。由于哈贝克本人在公众和党内的支持率很高，为了维持哈贝克的影响力以保证绿党的公众支持率，在当选党主席后，党内基层同意他兼任党内干部和国家职务。2023年，与哈贝克相关的裙带关系丑闻以及后续他平稳度过危机，也是绿党政治精英权力集中的典型例证。

绿党权力中心随着个人而转移的特征在当前的绿党内部体现得更为显著。2021年“交通灯”联合政府上任后，时任绿党双主席的哈贝克和贝尔伯克因为分别执掌新一届政府的经济与气候部以及外交部而卸任党主席职务，此后绿党实际的权力中心随着两人的离开而转移至其所在的政府。2024年10月，由于东部联邦州选举失利，绿党双主席引咎辞职，但这丝毫不影响绿党实际掌权人仍然是现任联邦经济与气候部部长哈贝克这一事实。2024年11月17日，绿党召开党代会，在没有任何其他竞争者提名的情况下，哈贝克以96.5%的选票当选为联邦议院大选的总理候选人。这次党代会上还选举了新一届党领导班子，其中新任党主席之一弗朗西斯卡·布兰特纳(Franziska Brantner)为跟随哈贝克多年、深得其信任的部下。媒体和学界都认为，哈贝克个人权力在党内进一步提升，其权威性无人企及。而在这次党代会召开前辞职的党主席之一里卡达·朗(Ricarda Lang)则被视为“普通党员代表的失败”的典型^②。

少数几位政党领袖之所以能作为当选者和代表获得对于选民和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其主要的原因在于领袖对于组织的不可或缺性，这也是政党出现“寡头政治”的重要原因。领袖有时通过彼此间的默契(比如相互承诺)操控各级代表大会的选举过程，从而使得普通党员事实上被剥夺了所有有关他们事务的决定权。党

^①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第42、140页。

^② „Alle hinter Habeck, Parteitag der Grünen“, Der Politikpodcast, *deutschlandfunk.de*, 2024-11-17, <https://www.deutschlandfunk.de/parteitag-der-gruenen-alle-hinter-habeck-dlf-a95b2be8-100.html>, 访问日期:2024-11-17。

内高层政治活动成为领袖们的专有特权,普通党员失去影响力。^①同时,领袖作为职业政客有更多时间专业从事政治,有权进行资源分配及借助媒体争夺、维护和巩固权力,进而领袖群体也逐渐蜕变为一个封闭的特权等级。

至此,绿党在其前身作为社会运动存在之时及其建党之初提出的直接民主原则在建党之后的发展中被证明是失败的。绿党有意识地做出的杜绝政党“寡头化”并阻止党内精英阶层形成的制度化努力也在实践中难逃失败的命运。回头看绿党的发展,有说其“叛变”,也有说其“成熟”^②,无论怎样,它再次证明了现代政党组织的一个普遍规律。^③

任何政党在成立之初都会极力宣传其“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不仅体现在该党的终极目标上,还表现在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上。^④绿党的革命性除了体现在其在意识形态上突破传统,亦体现在其在组织形式上也试图与普通政党决裂。但是绿党一旦在政治上趋于成熟,就对当初的承诺进行修改,从而使其本身的革命性仅存有字面上的、象征性的意义,至多停留在理论上。绿党最初关于直接民主的“幻想”破灭,代议制民主成为其必须面对的现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绿党的“幻想”无用,它不仅有用而且必要,其用处就是用直接民主的形式来掩盖寡头政治的实质。绿党需要这种“幻想”来推动党组织的发展壮大,获取更多权力,并更好地发挥其权力的影响力。

德国绿党在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正常化”“制度化”^⑤转变。在这

①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第135、350页。德国学界关于德国政党领导对党内决议影响的研究以及“非正式执政”(Informales Regieren)和“非正式政治”(Informale Politik)研究也为“寡头统治铁律”提供了论据。学者们得出共识:德国各政党的大部分决策过程与党基层无关。尽管几乎所有政党都将直接民主元素写入党章并且规定所有党员有调查权和决策权,但是政党领导层主要仅仅出于策略原因才征询党员意见,最终决策与普通党员无关。参见:Niko Switek, „Bündnis 90/Die Grünen: Modi der innerparteilichen Entscheidungsfindung am Beispiel grüner Bundesparteitage“, in Karl-Rudolf Korte/Jan Treibel (Hrsg.), *Wie entscheiden Parteien? Prozesse innerparteilicher Willensbildung in Deutschland.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Sonderband 2012)*, Baden-Baden: Nomos, 2012, S. 121 - 154; Jan Treibel, „Formales und informelles Führen und Folgen in Parteien: Ein mikropolitische Ansatz zur Analyse von internen Entscheidungsprozessen am Beispiel der FDP“, in Stephan Bröckler/Timo Grundens (Hrsg.), *Informelle Politik. Konzepte, Akteure und Prozesse*,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4, S. 323 - 349。

② 还有学者认为绿党是“成功的失败”,意思是从绿党支持率和参与执政的现状看是成功的,从绿党的初心来看是失败的。参见 Andreas Stifel, *Vom erfolgreichen Scheitern einer Bewegung*。

③ 同理,用这个普适的规律分析其他政党有助于理解他们的发展,比如德国的海盗党在德国各大选举中昙花一现的表现。海盗党坚持不同寻常的政党组织结构,其政党领袖缺乏对政治远见和对组织的理解,继续坚持所谓的“流动式民主”和“遥控式民主”,它作为政党注定失败,更不用说在政党体制里获取权力。

④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第319页。

⑤ Thomas Kestler, *Die motivationale Macht von Ideen. 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Grundlegungen eines ideenbasierten Neoinstitutionalismus*,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1, S. 201。

种转变的过程中，德国绿党和其他传统政党一样，没有也不可能逃脱“寡头统治铁律”的宿命。

六、总结与思考

如图 2 所示，德国绿党“寡头统治”或者“寡头化”趋势的发展过程始于政党实际目标的改变。在政党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标的前提下，组织原则必须适应代议制民主选举中的政党竞争，由此造成基层民主原则的空心化和领袖与普通党员愈来愈严重的分离，最后党内权力集中于政党精英甚至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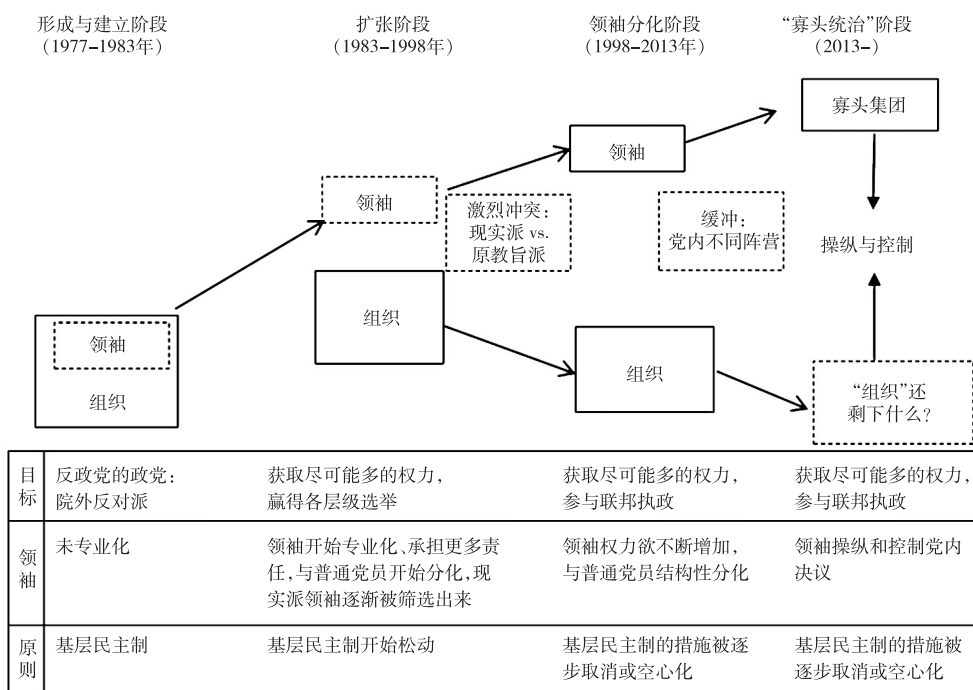


图 2 德国绿党“寡头化”发展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制^①。

在西方代议制及其政党体制内，政党的主要目的和行为就是获取权力，不断获取权力的政党必然发展成“寡头统治”。和其他政党一样，德国绿党为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就必须在德国政党体制内争取更大权力，也必须和必然形成“寡头统治”，绿党为此经历了一个被迫的学习过程。这是由当前西方的代议制民

^① 参见 Elmar Wiesendahl, *Parteienforschung. Ein Überblick*, S. 290, 此为作者依据该文献的信息自制的示意图。

主、政党获取权力机制以及精英民主思想所决定的。

米歇尔斯当年在得出德国社民党的“寡头统治”现实之后并未表现出悲观。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对任何政党或政府体系做出某种道德上的评判，也不意味着笔者认为民主是虚伪的谎言”。^① 本文分析德国绿党获取权力和“寡头化”的过程，目的在于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西方的政治现实。

第一，在西方社会，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如果试图在政治系统内争取更多权力、贯彻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就必须成立政党，借助代议制民主来实现。而“寡头统治”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西方的精英民主体制。

第二，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政党的“寡头化”问题难以解决，但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德国绿党的实例说明，政党制度对此的预防作用不大，个人和组织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则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关于“寡头统治铁律”的教育很重要，它有助于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并自我反思。这从建构主义角度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不能对现实中的民主抱以错误的期望。“民主之所以堕落为寡头统治，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某种寡头统治的内核”^②，“民主本质上更倾向于以威权的方式解决重要问题，它同时渴望荣誉与权力”^③。议会制只能消化代议制民主，而代议制民主是西方现代政党的唯一出路。一旦将现代政党纳入讨论议题，那么就不能期望展开彻底的、有意义的“民主”概念的讨论，而只能在具有寡头性质的政党民主框架内讨论问题。也就是说，在现实中的民主中，必定包含不民主的部分。反观之，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和认知中，所谓的“不民主”的实践也必定包含真民主的内容。纵观当今世界，还存在着很多其他政治制度，它们体现的价值观与西方民主话语体系价值观不同，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些制度中的真民主内涵。

第四，虽然议会制只能消化代议制民主，但它也会尝试利用其他形式的民主元素，比如在某些时候动用全民公决和公民参与式民主。^④ 但是这些元素仅仅只能作为补充，并且受到法律上的严格规制。

①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第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26页。

④ 该政治制度最突出的例子是瑞士，即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结合。通过全民公决做决议之所以在瑞士较为常见是和其国家规模小以及其特殊的历史相关。但是，即使在瑞士，全民公决的表决形式比议会政治决策还是少得多。德国绿党在2020年版的党纲中完全否定了全民公决的民主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性的“公民理事会”(Bürgerräte)，绿党认为，公民有议事权，但是全民公决会助长“民粹主义”和“反议会制”力量。Lenz Jacobsen, „Die Grünen: Bloß nichts riskieren“, *Zeit. de*, <https://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20-11/die-gruenen-parteitag-grundsatzprogramm-volksentscheide-demokratie-partei-5-vor8>, 2020-11-25, 访问日期:2024-03-06。

总之，在西方民主制中，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寡头化”统治，政党的“寡头统治”与其采取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保持批判和反思态度是对待西方政党和民主制度的正确方式。

最后，关于德国绿党“寡头统治”的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囊括到本文的分析中，但又值得进一步探究：在自媒体、网络空间空前发展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下，真相和事实的界限在虚拟空间被极度虚化，民众参与政治的可能和途径似乎在增加，这将对德国议会民主制度、政党体制带来哪些挑战和影响，德国绿党的权力获取途径、党内组织机制、领导人选拔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寡头统治铁律”在“政党数字化”^①越来越深入的时代是否仍具备有效性？在德国选择党和瓦根克内西特联盟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对以上问题的深入探讨将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伍慧萍

^① 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关于“数字化政党”的研究，包括数字化能否拯救代议制民主的相关问题。参见丁辉：《数字化政党：一个非类型学的理论框架》，载《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236-251页；Dennis Michels, *Digitaler Wandel in der SPD*,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1。